

## ■新作聚焦 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

## 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温情

□赵 勇

季栋梁的《上庄记》原来是一部中篇小说(刊发于《山花》2011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好评。之后,作者将其改写为近30万字的长篇作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成为长篇小说后,作品的内容果然丰富了许多,主题也不那么单一了。如果说原作的中篇小说反映的是乡村空巢后的教育问题,如今的长篇作品已大大越过了这一边界,成为中国偏远落后乡村世界的全景式写照。而且,它似乎也衔接上了中断多年的“问题小说”之线,赵树理式的隐忧与焦虑在小说中此起彼伏。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我”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学校里有40多个学生,却没有一个老师,扶贫干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一些孩子不断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庄的教育就更没人重视,已有名存实亡之虞。于是,老村长和“我”便里应外合,频频出招,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由此扩而大之,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他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他从自己的那个文化单位要来钱,便只好不断找关系、求老板,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问题。比如,“我”为了让盼着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动用了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为了让村里的几个特困户脱贫,“我”又与人合伙给功老板“下套”,让老板把20多万元的红包送到了乡

下。这位扶贫干部下乡一年,最终似已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我们知道,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大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来,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许多年之后,季栋梁也通过小说解决起了问题,但他的解决方式却令人深思:表面上他是解决了问题,但同时,这种解决本身已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另一方面,这种解决方式又治标不治本,于是,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背后却隐含着更严峻的问题——面对穷山恶水,面对老弱病残苦支撑的村庄,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村民希望所寄托者,是一个人脉广、关系多的扶贫干部,且这位干部恰恰又能被贫穷震撼出同情之心。倘若扶贫干部没什么能耐,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吊诡之处,而恰恰是这种吊诡显示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力度。因为表面上看,作者已用种种“歪门邪道”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似乎也是他提出更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和技巧。我想,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无权无势的扶贫干部,当问题已远远超出他的解决能力时,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除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之外,我还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温情。小说中有

一个细节:“我”当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一根烟》,那是在写另一个上庄的贫困。“我”进村之后,向村民一根根地散烟。在这些人中,有个名叫朱光耀的村民,他虽然接了烟,但却并不抽,而是架到自己的耳朵上。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位爱占便宜、怕吃亏的男人,后来才得知,原来老朱是位孝子,他拿这根烟是为了回去孝敬老娘。不管弄到什么东西,让老娘先尝已成为朱光耀的下意识行为。于是,“我”被震惊了。“我”的老板功全泰读了这篇文章,内心受到了感动,于是主动联系了这位扶贫干部。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给他“下套”,功老板也借坡下驴,主动“上套”。

我把这处细节看作一道理想主义的微光,它一方面依然让文学(《一根烟》那个真实朴素的故事)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老板的形象。在当今社会中,经过媒体渲染之后的有钱老板,要么是挥金如土、只知炫富的土豪,要么是腰缠万贯、没有文化的财主。“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似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定位。然而,《上庄记》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读了文学作品还能热泪盈眶的老板,一个为了寻到作者打了58个电话的老板。现实中,这样的老板究竟占多大比例,无从统计,但小说中的这个功老板却有慈悲之心,尚慈善之道。他不但让“我”渡

过了难关,而且还为小说注入了一股暖意。

在小说《上庄记》中,能够体现现实主义冷峻和理想主义温情的还有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在“我”的眼中,老村长是“狡黠精明”的,他懂得与扶贫干部搞好关系,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老村长拎着蛇皮口袋给“我”送羊腿的那一幕。然而,随着小说故事的逐渐展开,我们才看到这种“精明”背后,深藏不露的是他对上庄这块土地的大爱之情。因为老村长不可能接近上层,他便只能用自己朴实的言行亲自打开底层社会这幅世俗人心的画卷,默默地传递爱的能量,并用这种能量潜移默化地感动扶贫干部,让后者不得不去上庄奔走呼号。他既是乡村世界这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又是让扶贫工作能够落实到位的发动机。他的苦苦支撑让人感到了某种悲壮,他的不屈不挠又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支撑着底层的民间社会,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季栋梁在小说《上庄记》中,凭借着对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让他有了赵树理笔下“中间人物”的文学光彩,同时又为他注入了当今时代丰厚的道德伦理内涵。这样,老村长也就成了一位典型人物,成了老黑格尔所谓的“这个”。也正是因此,这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 ■创作谈

这些年下乡一直是我的一门重要功课,一方面我出生于农村,虽然混进城里已经多年,近年来父母也相继去世,村子里已经没有嫡系亲属,但根还在农村,亲友邻居枝枝丫丫的关系纵横交错,还有些亲情需要眷顾,尤其是步入不惑之年,怀旧的情绪日益一日。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以前在省报做记者,深入田间地头采访是一门重要功课,后来调入政府研究部门,每年的重要工作就是下乡调研,每月至少下乡一次,一次就是一周,加上驻村蹲点,三同五同的。因此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行走在乡村。

而每个学年开始,与家乡千丝万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孩子入学上,只要沾点亲带点故的都会找上门来,成了我最大的负担。村庄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孩子多、后世重,而“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那么强烈与迫切。因此,这是一件没完没了的活计。能用的关系已经用了好些年,我只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发毛了,接我的电话都有些神经质。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能是威逼利诱要无赖地努力着。同时,还肩负着为他们找活、讨薪、打官司,凡此种种。有时候觉得不堪重负,可一想到他们的处境与愿望,就不能不努力去做。毕竟这是一条可以让他们体面地走向世界的重要道路。

缺失了青壮年的村庄,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与激情。走进村庄寨堡,散落在村落里的全是老人和孩子,一双双眼睛迷茫、孤寂、散漫、无奈。不要说是听到此起彼伏的情歌民谣,就是鸡鸣狗盗、牛歌羊唱的情景也是越来越稀罕了,许多村庄已经废弃了。行走在村落中,让人想到小时候老人一讲故事就要提到的深山老林,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被我们描述过的乡村正在消失,留给我们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守儿童的老人和孩子落寞地坐在这巨大的空白里,无所适从。他们的温饱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可是又带来了新的苦恼,生老病死的传统意义显得那样的强烈,建立在乡土社会之上的家庭伦理正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媒体记者甚至是专家在提及乡村时,用了“凋敝”这个词。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10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天中国都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比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改运动更为波澜壮阔,每个人都牵扯其中,带给许多人“乡关何处”的困惑。毋庸置疑,变革中的农村、农民甚至是农业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城镇化脚步。

因此,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当下农村题材的作品。可怎么写却成了一个难题。倘若按照常规的小说写作,写一个或几个人、一家或几家人命运纠葛,就无法反映目前整个农村恍惚、焦虑、困惑的现状,而变革中的农村比我们想象、构思出来的更为扎实厚重。写作的过程中,我想到了毕飞宇在谈创作《推拿》时说过的一段话:“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这一高论值得我们借鉴,对于小说家来说想象力固然重要,但理解力同样重要。关于农村和农民,人们有些习惯性的看法和说法,事实上对于农村和农民,我们缺失的正是理解力。

因此,我选择了原生态的写作。我特意想说“老村长”这个人物形象,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村级干部形象,应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留守老人。父亲说过一句话:苦下到哪达哪达亲。那片土地,留给了他的奋斗与梦想,留给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他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样的人想要让他轻易离开土地,那就是一种剥离。宁夏南部山区有一句话:好汉护三庄。意思是说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人,要看护好三座以上的村庄。老村长更像一个家长、一条好汉。

□季栋梁

## 现实比想象更扎实厚重

## ■看小说

## 王祥夫《金色琉璃》

## 美与哀愁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金色琉璃》(《芒种》2014年第4期)描述了一个温情而感人的故事。金麦无以排解丧母之痛,更兼“子欲孝、亲不在”的抱憾;身为琉璃工艺师的她一直想亲自给母亲做一个金色的琉璃瓶,却迟迟未曾动手,直到母亲溘然离去。小说笔触真挚细腻,美丽、奇幻而又易碎的“琉璃瓶”如同无处不在的亲情,在“高温”中融化、凝固,盛满温暖、关怀和眷恋。

母亲离世后,金麦睹物思亲,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节奏和重心,就连自己熟悉的家也令她感到陌生。渐渐地,她的行为举止变得有些失常——她不仅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口琉璃瓶(“如果腌泡菜,一次能吃半年”),还在网上征集“临时母亲”想要一同过年。小说中两次写到金麦“感觉到自己把眼泪咽回到肚子里去了”。金麦的状态让丈夫大李无比担忧,甚至打电话询问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这样下去金麦会不会得抑郁症。同时,大李小心翼翼地藏起了厨房墙上挂着的一把“用来给鱼开膛”的大剪刀,并且准备答应金麦,让一个陌生老太太来家里一起过年,还准备把那个巨大的琉璃瓶送给老太太,只要她能够解开心结。结果,读过其中一个老太太长信后,大李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无法想象那个孤独的老太太“一个人过年、一个人包饺子一个人吃”的情形。新年这天,大李和金麦一道带着琉璃瓶,开车去了老太太家。琉璃瓶用包装纸一层层包裹着,平稳地放在汽车后座上,“你不知道它有多漂亮”。

(刘凤阳)

## ■评论

## 从“游荡”到“游牧”

——关于陈超《诗野游牧》及其“现代诗话” □霍俊明

陈超的《诗野游牧》是他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的一部分。这种“现代诗话”的方式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和诗歌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作者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早在20多年前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中,这种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建立,陈超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省察,正因如此,他诗歌批评的独特魅力和趣味性已经被诗坛所认可。

“新诗话”(沈奇语)对于陈超而言并不是外加的部分,而是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部分。“现代诗话”这种直接开启生命深处秘密和血脉的批评方式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它给陈超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真正的快乐。而长久垂心于“现代诗话”很大程度上又与陈超的诗人身份密切相关。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马迹抱有探幽烛微的能力,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

再者,“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而恰恰正是这种特殊的诗歌批评话语,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独特性。

这使我想起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绝对的“少数者”或者“异秉”。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躁雪性情的人,是不可能为之的。在陈超为中现代诗所做的导读和鉴赏的过程中,这种特点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陈超的诗歌批评就语言而言是中国诗歌评论家中最为“讲究”和具有难度的。

在陈超看来,“新诗学”也是一场语言的实验。他几乎对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推敲和捶打、淬炼,而这一过程又非常可贵地在高度精准的同时维持了语言自身的趣味。在陈超这里,追求“母语的荣耀垂直洞开”不仅不是拒绝阅读的,更不是艰深晦涩、枯燥无味的。而这种话语方式在精神本源上与“诗话”传统一脉相承。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要更高级和进步,而是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本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陈超的“现代诗话”则以贯之地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考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近乎残酷和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领受到这一过程中的快乐与慰藉。正如他那首感动很多人的诗句,“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悒镀亮”。

《诗野游牧》所体现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在以往的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以及《诗与真新论》中,陈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这实际上正是陈超所说的,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魂和困境的双重揭示。而到了《诗野游牧》,如此诗意、轻松、舒朗、清逸的说言方式确实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空间。

从“游荡”到“游牧”,正如陈超所说,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

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在我看来,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批评家中的少数人。

当然,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同时存在。“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理想主义甚至诗学的个体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歌批评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以小博大”。看似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海撤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敞开的过程正对应了“诗话”的本质。也正如陈超所言,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换言之,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惟有如此,才印证了诗歌批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诗有别趣”,同时又印证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彼此观照。正如陈超所说的,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无法想象的难度。我希望陈超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精神的游历和放牧与复杂性的、现代性的精神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诗歌批评的“游荡”和“游牧”精神的人应该算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了。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无法想象的难度。我希望陈超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精神的游历和放牧与复杂性的、现代性的精神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诗歌批评的“游荡”和“游牧”精神的人应该算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了。

## 小百花越剧团迎来“而立之年”

本报讯(记者 王冕)

今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30周年。6月下旬,该团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为首都观众奉献一系列精彩的演出,为自己的“而立之年”庆生。近日,此次演出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戏剧导演郭小男及“小百花”的忠实践迷欢聚一堂,共话“小百花”而结下的不解情缘。

自1984年成立至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不仅创作出《五女拜寿》《琵琶记》《西厢记》《陆游与唐琬》《藏书之家》和新版《梁祝》等优秀作品,还培养了诸多知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入选为39家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之一,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茅威涛表示,在三十而立的今天,历经市场与生存考验的“小百花”已从困顿

## “我的儿子皮卡”陪伴孩子成长

本报讯 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京举办曹文轩“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丛书出版五周年庆典。

桂晓风、海飞、贺绍俊、李东华、翌平、安武林、王乐芬等与众多小读者一起分享“我的儿子皮卡”带给读者的感动与启迪,体味那一段成长岁月的魅力。

“我的儿子皮卡”系列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首部少年成长系列小说,目前已出版了10册,累计销售140多万册。该系列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了小男孩皮卡的成长故事。皮卡从出生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为这个世界创造故事。他以一个孩子的清纯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一时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但初

涉人世的皮卡还是在一片懵懂中一天天成长起来。这些成长包括身体的、心理的乃至精神的成长。我们在“我的儿子皮卡”中,看到的是伴随着小说情趣一同产生的幽默感,它脱离了粗俗的搞笑,带有梦幻的气质、隽永的意味。

5年来,“我的儿子皮卡”陪伴着读者共同成长,通过那些令人叹息的感人瞬间、令人沉思的悲悯情怀,也让读者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体会到人生之初的单纯是如何一点点被描绘得五彩斑斓的。孩子们从中体验到了成长的快乐,父母也在书中重温了那段塑造孩子心灵和性情的时光。(李墨波)

## 谢云、苏士澍、杨再春书法联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6月14日,“臻妙——谢云、苏士澍、杨再春书法联展”在北京雍和宫艺术馆开幕。

展览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北京雍和宫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承办,共展出了这三位书法家的60幅作品。

此次参展的三位作者不仅是书法界造诣颇深的前辈,而且都是由出版界走出来的。谢云自小钻研草篆,其字古拙绮丽,虚实结合,拥有散而不乱、令人难忘的个性;苏士澍兼习诸体,善以鸡毫作篆书、隶书,饶有特色,行书亦流畅含蓄,韵味浓淡;杨再春的作品既有魏晋南北朝的神韵,又有明清时代的

雅趣与朴拙。此次联展通过三位书法家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书法的艺术与魅力。

据介绍,为打击书画造假,此次书法展

## 孙绳武同志逝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孙绳武同志于2014年6月9日逝世,享年97岁。

孙绳武,笔名孙玮。译著有《卢笛集》《希克梅特诗集》《吉洪诺夫诗集》《巴努斯诗选》《人》《莱蒙托夫传》《普希金传》《托尔斯泰评传》《高尔基传》《谈诗的技巧》和《俄国文学史》(合译)等。

## 张家口创排口梆子剧《魂系京张》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月11日,由《中国水墨》杂志社和竹语间艺术中心主办的“文人意象——艺术生活呈现展”在京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了刘知白、韩羽、吴悦石、杨春华、李学明、董浩、胡石、傅廷照、袁武、王艺、李文亮、刘廷龙、张捷、许宏泉、姚震西、王有刚、韩璐、丘挺、汪为新、金心明、大乐、范治斌、刘静等艺术家的书画和家具作品。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不少艺术家始终坚守与探索着中国文